

“好得很”还是“糟得很”

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，工农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。在湖南、湖北、江西等省广大农村，到处燃起革命的烈火。

在这些省份，首先高涨起来的是农民运动。1926年9月，毛泽东发表《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》一文，指出“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”。“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，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”。同年11月，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，决定以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河南的农民运动为重点。在湖南，从北伐军1926年夏进入那里到第二年1月，农民协会会员从40万人激增到200万人，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人，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经组织起来。农民有了组织，便开始行动起来，发动了一场空前的农村大革命。“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，不法地主，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，城里的贪官污吏，乡村的恶劣习惯。”在那些打倒了地主政权的地方，农民协会便成为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，真正做到了“一切权力归农会”。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，到1926年11月间发展到20万人。江西的农民协会会员，到10月间也有5万多人。在这两个省，也开始出现农村大革命的形势。毛泽东在当时就指出：“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。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，所以失败了。现在有了这个变动，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。”

在城市，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。湖南、湖北两省总工会在1926年九十月间相继成立。到1927年1月，两省的工会会员发展到70

人。江西省总工会也正式成立。在湖南、湖北、江西等省，都仿效省港大罢工的经验，组织了武装的工人纠察队。长沙、武汉、九江等城市的工人相继举行大规模的罢工，提出增加工资、减少工

时、改善劳动条件、反对封建性工头和包身工制等要求。这些斗争大多取得了胜利。

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，有两种截然不同态度。一种是“好得很”，一种是“糟得很”。

两种声音的立场是完全不同的。分歧的核心在于阶级立场和对革命路线的认识。说好得很的是站在中国革命的立场上，站在广大受苦受难的农民的立场上，而说糟得很的，多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，特别是站在北伐军军官家属是地主老太爷的立场上。当时参与发动湖南农民运动的毛泽东，是坚决站在农民一边的。他对于湖南农民运动就是大声疾呼“好得很”。他坚决反对那种说是“糟得很”的观点。

如何看待工农群众以及工农运动是一个重大问题。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是毛主席 1927 年 3 月写的一篇光辉著作，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。当时的农民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，主要口号是：打倒帝国主义，打倒军阀，打倒贪官污吏，打倒土豪劣绅。革命的对象主要是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。农民起来同几千年来的封建主义势力作斗争，这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事，无疑是天经地义的革命行动，它不仅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，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内容，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？可是当时的情况是非议的浊浪甚嚣尘上，“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‘糟’字”。毛主席力排众议，到湖南考察三十二天，写下这篇文章，批驳了种种错误论调，肯定了农民的革命行动，使一切反动派和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，提供了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光辉范例。

首先毛主席指出了农民运动的严重性，在城里和乡里听得的道

理“完全相反”，指出：“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，都必须迅速矫正。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，必须迅速变更。这样，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。”就是说如何对待农民运动问题已成为关系革命前途的严重问题。“在很短的时间内，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的中部、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，其势如暴风骤雨，迅猛异常，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压抑不住。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，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。一切帝国主义、军阀、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，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。一切革命党派、革命同志，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。是站在他们前头领导他们呢？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？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？每个中国人对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，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”毛主席在这里明确地告诉人们，不是各党各派各阶层的人肯定或否定农民运动的问题，而各党各派各阶层接受农民运动检验的问题，也就是说谁想否认农民运动是不能得逞的，是否认不了的，只是暴露了自己的反动面目而已。

对于右派们“糟得很”的论调，毛主席指出：“实在呢，如前所述，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，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。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，不法地主阶级，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，帝国主义、军阀、贪官污吏的墙脚。打翻这个封建势力，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。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，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，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。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。这是好得很。完全没有什么‘糟’，完全不是什么‘糟得很’。‘糟得很’，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，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，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，明明是反革命理

论。”毛主席旗帜鲜明，理直气壮地将所谓“糟得很”的论调驳得淋漓尽致、体无完肤，读来令人振奋。

对于中派的所谓“过分”问题，毛主席指出：“第一，上述那些事(即所谓农民的‘过分’行动——作者注)，都是土豪劣绅、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。”“第二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从容不迫，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……所有一切所谓‘过分’的举动，在第二时期(毛主席将农民运动分为第一时期即组织时期和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——作者注)都有革命的意义。质言之，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，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，决不能打倒绅权。矫枉必须过正，不过正不能矫枉。这一派的议论，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，但实质则和前一派站在同一个观点上，依然是维护特权阶级利益的地主理论。”毛主席在此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所谓‘过分’论的反动本质，同时也告诉人民：一切折中主义并不折中，其实质都是反革命的帮凶。

所谓“痞子运动”，主要是对农会中掌权的贫农的诬陷。毛主席为他们摘下“痞子”的帽子，戴上“革命先锋”的桂冠。“这个贫农大众，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，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，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，成就那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。”

“没有贫农，便没有革命。若否认他们，便是否认革命。若打击他们，便是打击革命。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”并对国民党县党部派兵下乡捉人表示了坚决反对，指出农会中即使有“少数不良分子”，也只能“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，对群众做宣传，对他本人进行训练，把农会的纪律整好，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，损害

农民阶级的威信，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。”这里毛主席告诉革命党人，革命群众运动具有天然的合理性，要看大方向，看主流，看本质，不能抓住个别非主流非本质的支节问题，以偏概全，全盘否定。对于非主流非本质的不良倾向也只能善意批评，正确引导，不得进行无情打击。

毛主席力排众议，正面肯定，热情讴歌农民运动，体现了毛主席敢于反潮流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，体现了他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，为共产党人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。其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光辉。

2021年7月1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，江山就是人民、人民就是江山，打江山、守江山，守的是人民的心。总书记这一精辟论述，是对党的百年历史的深刻总结，是对党的性质宗旨的生动诠释，是对党的初心使命的高度概括。我们党根基在人民、血脉在人民。党的百年历史，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，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、同呼吸、共命运的历史。